



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徐培汀、裘正义著

重庆出版社

作了认真的论述。

本书综览全局，驰骋古今，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中国新闻学术发展的全过程，对几乎所有代表性的新闻学者和新闻论著，都作了认真的论述。

乎所有代表性的新闻学者和新闻论著，都考察了中国新闻学术发展的全过程，对几乎所有代表性的新闻学者和新闻论著，都综览全局，驰骋古今，全面而系统地作了认真的论述。

本书综览全局，驰骋古今，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中国新闻学术发展的全过程，对几乎所有代表性的新闻学者和新闻论著，都作了认真的论述。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徐培汀 裴正义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显军
封面设计 卢 军
技术设计 忠 凤**

徐培汀 裴正义 著
**ZHONG GUO XIN WEN CHUAN BO XUE SHUO SHI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 7 字数 342 千
1994年3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1,201—3,200

*

ISBN 7-5366-2629-0/G·927

定价：25.00元

钱辛波序

中国需要一本新闻传播学说史，这本书无疑是在历史需求的呼唤中应运而生的，而且是10年改革来的第一本。

作者首先阐述了新闻学的存在状态问题，以大量学术史实证明，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的中国新闻学正处在由潜科学（又称前科学）状态向显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波澜起伏的理论发展时期。

自从新闻学萌生以来，新闻是否有学之争也随之俱起，到现在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那时就有人认为，新闻只是一个充满实践知识的领域，报纸编辑部就是最好的新闻学校。20世纪之初，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创立新闻系，当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新闻理论遂于争辩中发展，不过半个世纪，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个大学有了新闻系。新闻无学论的声音越来越低。

但在中国，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反复就要更多些，更加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可以明白地指出，新闻无学的论点在中国更有市场。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复杂，在中国，近代新闻业出现得比较晚。当西方列强用炮舰撞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时，中国知识界的先驱们，以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为了传播新思想、新知识，为了变法图存，一下子变成了积极的报刊活动家，走上了“政治家办报”的道路。这条道路影响了几代人。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从报刊活动入手投身于政治生活，这仿佛说明，没有经过正规的新闻教

育的人，也能办报并且办得满不错。实际上，这正是急迫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掩盖了人们对新闻学问题的注意。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天地翻覆，一方面社会确实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方面这种社会历史进程受到旧的传统思想、旧的传统惰力的拼死反抗和迟滞。这种现象，建国以来仍然存在，在新闻学术研究方面则表现得非常突出。理论和实践发生了冲突，理论在一度走到历史进程前面之后，又大大滞后了，因而不能及时地、比较充分地说明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人们被大量的实践现象迷惑了。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确实看到相当多的人在纷繁转变的社会变革年代，没有在学校里专修过新闻课程，但他们照样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有的还当上了这一方面的领导人。“实践出真知”确实是这个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

经历了理性思考之后人们不难发现，在建国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重实践经验，轻视理论发展的倾向被强化了，理论思维成了现实生活中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且在新闻学研究方面更甚。在新闻体制方面，实行单一的机关报体制也使轻视新闻理论的倾向得到了加强。下级听命于上级，一切按领导的意图办事，漠视新闻的自身规律，因此造成了新闻学理论的萎缩。而这种萎缩则加剧了实践中的混乱。

事实上，从实践的意义上说，“新闻无学”的论点的要害在于，如果此论成立，那么在这个领域里自然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妄行。有不少新闻界的悲剧就是这样造成的。甚至也有的人愿意看到“新闻无学”现象的存在，因为这样的话，容易形成一种“愚民状况”，这自然是理论的悲哀。

1966～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新闻无学观点的鼎盛期。在那个动乱年代，谁讲“新闻规律”谁就会遭受政

治压力。新闻媒介完全混同于政治工具，仅有的几个大学新闻系也消失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新闻学的摧残，中国新闻学在这段时期内的落后，是值得中国几代人来思考的。

为什么要研究新闻学说史？意义很深远。现实意义之一，就在于使新闻学不再是一门看眼色行事的学问，并进而从这种窘困的境地中摆脱出来，真正成为一门充满活力的、充满理论思辨的科学。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新闻事业会更加健康、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

中国常以文明古国自诩。新闻事业赖以发端的纸张、印刷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谈起报纸的起源，更是要历数汉唐邸报、宋朝小报和明清的京报。这确实使人自豪。问题在于，如果说在遥远的过去中国确实先进过，那么为什么今天落后了？纸和印刷术为什么不能推动起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最后要在19世纪由外国人来中国办报才书写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的首页？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建国之后，曾出现过多么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样的时机竟会被白白放过，使中国新闻事业出现了新历史条件下的落后？怀着这样的问题，看看这部书是会很有益处的，因为作者提供了大量的事实并对它们作了具体而详尽的分析。

既然我们面对的是新闻传播学说史，就必须实事求是。几年前，我曾听到一位负责人在谈到西方的大众传播学时说，这种论述中国自古就有，并举孔子、老子的若干语录为证，说传播学的老祖宗在中国。这种只凭只言片语，牵强附会地考据“正宗”的做法，和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没有多大区别，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以为，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新闻学确实有着自身的内在规律，并且探讨这些规律是怎样被

人们逐步认识的，从而促使人们去揭示新的规律，使更多的人按照新闻规律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

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说史也要探讨新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发展中的联系，探讨新闻学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联系。我想，阅读了本书的读者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充分的国家政治民主的条件下，新闻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新闻学学术民主的空气才会浓厚起来；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每一个关心新闻事业发展的公民，都应该保护和推动新闻民主和新闻自由。这样，研究和了解新闻学术思想的发展，才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了解而了解。作者深意，也在于此。

在现今中国，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但新闻理论的研究仍嫌薄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人们把眼光更多地注视今天，这是一片宽阔的研究领域。建国 40 年来，新闻事业所经历的起伏波折，是非非，还有许多没有从新闻学的角度寻得好的答案。40 年来，经验和教训相比，教训远为深刻。但是，现在还有把教训当作经验来看待的人和事。在新闻研究领域，“左”的倾向、僵化的思想远未绝迹，有时还表现得相当顽强。因此，要从各个方面发展我们这个民族的理论思维，在新闻学领域更要提倡进行系统研究。任何一种理论，只有在形成系统之后，才是完整的、严密的，才算得上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在今天，新闻学尤其需要这样做。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自由和新闻学术研究自由得到进一步的保证。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任务，我们这一代所做的仅仅是一个开头。而这部《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就是向前迈出的有力一步。有了这一步，就会有更多的人由此通过，会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希望寄托在今天的青年身上，寄托在今后几代人身上。

谨以此为序。

1989年3月20日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钱辛波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新闻学刊》主编、
中国新闻学会副会长)

余家宏序

新闻原本是“无学”的。早年办报人用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学访事、学通信……，后来由于传播业务发达，对信息的需求增大，又有了交通便利的条件，加上报业间的竞争，要想方设法吸引读者，于是产生了新闻学。在西方，最早的新闻学著作出版于1845年；在中国，1903年也把1899年日本出版的松本君平著的《新闻学》翻译介绍过来了。即使从中国人徐宝璜著的《新闻学》出版的1919年算起，新闻学在中国也整整有70年的历史了。

近代中国思想家在运用报刊进行思想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同时，也表述了自己的新闻观点——这些观点大都散见在他们的作品或介绍他们的文章中，没有从新闻学和新闻思想发展的角度系统地整理出来，因此也不可能了解它们的发展脉络和日后对报刊工作的影响，以致长期形成了“新闻无学”和“新闻不必学”的状态。“新闻无学”论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其中之一恐怕是无专门论述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缘故，所以人们对它十分生疏，在学术界难占一席之地。徐培汀、裘正义同志合著的这本《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正是为了填补这项空白而编写的。

徐培汀同志多年从事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又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新闻学说史》一课，这本书就是在教材的基础上，和研究生裘正义同志一起充实、加工、整

编、重写而成的。本书最大特点不仅有详实的史料介绍，而且对各种新闻观点出现的社会因素及其对新闻实践的影响，都作了中肯的分析，表达了作者自己的见解。它是一本教材，又是一本专著。

过去研究新闻学，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忽视了作为人类共同文化内容的一面。40年代初，延安新闻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党报观念的教育，但新闻学中的基本原则，诸如“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必须真实”、重视读者群以及新闻事业应当反映时代面貌等等，仍然是作为唯物的新闻观提出的。我们充分肯定延安时期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新闻工作实践结合的党报学说，同时也必须认定新闻学中的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和民主主义新闻思想的继承性。当年延安《解放日报》在《致读者》的社论中所指出的“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报刊任务，到今天并未过时。

温故知新。我们能够全面地了解各派新闻学说和它们的发展过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当前的新闻改革，都大有好处。

1989年1月1日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余家宏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方汉奇序

中国人在文章和论著中，阐述自己的办报主张和新闻思想，至少有 100 年以上的历史。“新闻学”这三个字，在本世纪最初几年，也就是 80 多年前，就已见于中国报刊。可见，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并不短，虽然在林林总总的人文科学诸门类中，它仍然是一门十分稚嫩的学科。

近代新闻事业肇始于西方，中国近现代的新闻事业曾经接受过西方的影响。在新闻学的研究上也是这样。早期的中国新闻学研究，曾经明显地接受过来自欧美和俄国这两方面的影响。日本这个中间站，在一个时期内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建国后，政治上一边倒，新闻学的研究也是一边倒，一度出现过全盘苏化的倾向，直到 60 年代以后才逐渐有所转变。但不论在什么时期和什么情况下，中国的新闻学研究都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壤，由中国人自己来耕耘，带有明显的中国特点，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科。

早期的中国新闻学论著，多数出于办报人之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是专门的新闻学者。在他们的笔下，新闻学的研究，是和他们的办报实践紧密联系的。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既总结了他们自己的办报经验，又结合引进的各种新闻学观点，和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提出一些主张，企图给实践以指导。随着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才逐渐有一些专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新闻学者，出来对新闻学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出一

些规律性的东西，著书立说，阐明自己的主张。后一部分论著，虽然成于学者们的书斋，多少有一点学院气，但许多素材和观点仍然来自实践，与实践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中国的新闻学术论著，大体上是由以上两部分组成的。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发展的历史，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轨迹，也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以古鉴今，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一点。

过去一段时期，在我国新闻界曾经流行过所谓“新闻无学”的说法，这种说法是一种明显的偏见，是不符合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实际的。本书所展示的历史画卷，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既有源也有流，既有师承也有发展，可以评论分析其荣枯得失，而不容轻率否定。对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成果持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对的。

培汀同志治新闻学有年，孜孜矻矻，蜚声于时；本书是他与裘正义同志合著的新作，它的出版，为新闻学教学研究工作者、新闻院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广大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了一部研究和学习新闻学的重要参考书，相信它一定会得到读者们的欢迎的。

1988年12月22日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方汉奇是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

徐培汀，1932年1月20日生，浙江新昌人；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副会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学会副主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应用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主编《新闻学词典》(1988,浙江人民出版社)、《新闻文存》(1987,中国新闻出版社)，与他人合著《新闻心理学漫谈》、《资料工作与新闻》、《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等专著。撰有新闻学论文400多篇，其中《遵循新闻规律，推动新闻改革》为1992年度全国新闻学术会议获奖论文。1983年12月和1991年12月，先后两次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新闻工作者，1995年12月15日，荣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6年5月荣获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韬奋园丁奖，1996年12月30日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作者简介

裘正义，1964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91年获复旦大学法学博士，1992年赴美进修，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新民晚报社主任编辑。著有《世界宣传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大众传媒与中国乡村发展》（群言出版社）、《宣传学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公关艺术77题》（金盾出版社）、《新闻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等，主持国家青年社科项目“跨国传播与民族文化变迁”、上海市社科项目“上海新闻传媒发展战略”等，先后获国家教委社科成果二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二次）、上海市新闻学论文一等奖。

目 录

钱辛波序.....	(1)
余家宏序.....	(1)
方汉奇序.....	(1)
绪 论.....	(1)

第一编 古代部分

第一章 先秦传播思想.....	(9)
第一节 先秦传播活动.....	(9)
一、传播符号及其变迁.....	(9)
二、传播媒介的发展	(11)
三、采诗与史官	(14)
第二节 先秦诸子对于信息传播一般规律的认识	(15)
一、传播过程中有效信息的递减与失真	(16)
二、对于传播工具的重视	(17)
三、在各类传播中尤其注重劝服传播的研究	(18)
四、传播过程中的失实及审察	(19)
五、对传者的道德要求	(20)
第三节 先秦劝服传播思想	(20)

一、信——传播的态度	(21)
二、实——传播的内容	(22)
三、譬——传播的技巧	(23)
第四节 先秦民主思想与言论自由观	(24)
一、原始的民主思想	(24)
二、春秋诸子的民主思想	(25)
三、制度	(26)
第二章 秦汉传播思想	(29)
第一节 秦汉传播活动的发展	(29)
一、秦始皇的统一文字与焚书坑儒	(29)
二、汉代传播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30)
第二节 邸与新闻传播	(32)
一、邸的设置	(32)
二、官方新闻传播基本渠道	(33)
第三节 秦汉传播思想	(34)
一、《吕氏春秋》与秦代传播思想	(34)
二、“天人感应”学说与专制思想的产生	(36)
三、朝议制度与政治传播中的有限民主	(37)
第三章 隋唐传播事业与官报体系	(40)
第一节 隋唐传播事业的发展	(40)
第二节 邸报与官方新闻传播系统的形成	(43)
一、露布	(43)
二、条报	(43)
三、进奏院状报	(44)
四、其他	(45)
第三节 唐代传播思想	(46)
一、官报的编辑思想	(46)

二、陆贽及其言论自由思想	(47)
三、文风的改进与对传播规律的认识	(48)
四、“新闻”一词的出现	(50)
第四章 宋代传播事业与传播思想	(52)
第一节 宋代传播事业的昌盛	(52)
第二节 宋代官方信息传播系统	(54)
第三节 宋代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控制	(57)
一、限制传播与防止泄漏	(57)
二、新闻检查制度	(59)
三、出版法	(60)
第四节 宋代小报与民间新闻传播	(62)
一、宋代小报的传播思想	(62)
二、民间其他新闻传播方式	(64)
第五节 宋代新闻传播思想	(65)
一、宋代邸报传播思想的发展	(65)
二、小报的传播特点	(66)
三、国家新闻控制思想	(66)
第五章 明清新闻传播思想	(69)
第一节 明代邸报与新闻控制的发展	(69)
一、明代邸报的新特点	(69)
二、新闻控制思想的变化	(71)
第二节 民间传播的多样化	(72)
一、民间报纸与舆论	(72)
二、其他传播方式	(74)
第三节 清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75)
一、政治传播组织系统	(75)
二、《京报》及其特点	(77)